

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

胡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几百年来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奠基于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而且知识理论在未来社会中将发挥更大的主宰作用,所以未来社会可称为知识社会。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更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石。为实现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必须改变模糊笼统的传统思维方式,完全遵循学术思想发展自身的规则,在分科治学的前提下对相关问题做严格精致的论证和辩护,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做跨学科的交流,按照知识理论创新的需要来加强和管理学术研究机构。

关键词 知识社会;知识创新;创新基础

1 知识创新引领社会发展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着剧烈变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格外的混乱、格外的无序。但在这种混乱与无序之中却显示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事实,那就是知识在急剧膨胀并极其迅速地传播。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知识已渗透、蔓延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使社会及其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知识已把触角伸展到未来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首先注意到知识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发生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权力分配论”的理论。

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谁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到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知识理论及其技术的迅速进步和普及,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系

统。专门知识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力就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人手中。这些人被称作“技术结构阶层”。

权力的转移引发了几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1) 现代公司的新目标在“技术结构阶层”掌权之后,已从过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标转变为追求“稳定”、“增长”和“技术兴趣”等目标;2) 为实现“稳定”这一首要目标,商品生产已由过去的“消费者主权”理论转变为“生产者主权”的理论;3) “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企业与银行、国家、工会、科技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不再融合,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企业与国家融为一体等;4) 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的冲突,主要是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间的对立。

“权力分配论”的新颖独到之处,是完全从“知识”这一全新的视野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内部结构所发生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从目前看,且不管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一点很清楚,即加尔布雷斯将知识看作是现代社

会的核心要素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自此以后整个世界都因知识的急剧增长和迅速传播而发生了深刻变化。

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不断得到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的回应。一时间,以“知识”为核心范畴来描述、分析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知识”来构想未来世纪的社会总特征,成为一种特别受人青睐的时尚。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就是运用“知识价值”一词来描绘未来社会的总体特征,而且他把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干脆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知识价值社会”是由“知识价值革命”引起的。他认为,这种“知识价值革命”在日本、美国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的普及而产生的。他指出,“知识价值社会”是比起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说更加重视创造“知识与智慧价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会减少对物质财富的数量方面的需求,而会增加对取决于社会主观意识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需求。

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

收稿日期:2016-02-21

作者简介:胡军,教授,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发展战略委员会常务理事、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子邮箱:

hujun0815@pku.edu.cn

引用格式:胡军. 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J]. 科技导报, 2016, 34(4): 22-26;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04.003

学家托夫勒则完全从“知识”出发来分析 and 描绘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

在《权利转移》一书中,托夫勒明确指出:传统的政治权力概念有两大要素,即暴力和财富。以暴力为实质的权力是低质的权力,财富则创造了优于暴力的权力。然而真正高质量的权力则源于知识的应用,因为知识可用于惩罚、奖励、劝说甚至化敌为友。现代意义上的暴力和财富必须以知识为其基础。没有相应的知识作为支撑的暴力和财富已经被当今的世界人类看作是另类,必将迅速推出历史舞台。而且必须看到的是,力量和财富无论就数量和程度上讲都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排他性。而知识则大不一样,你掌控了相关知识的事实并不能影响我或其他人来把握相同的知识理论系统。从知识性质的角度讲,同一知识可以为所有的理性的动物把握。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还可以产生更多的和更新的知识。总之,知识具有无边际的延伸性和时空的无限性。可以说,知识是最民主的权力之源。

由于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全面渗入,现代的经济生活也出现了急剧的变革。随着服务及信息行业在发达国家中的增长及制造业本身的自动化,财富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尽管投资于落后工业行业的人仍将工厂、设备及财产等“硬资产”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但在急速增长的先进行业中投资的人却依赖于知识或信息这一完全不同的因素来保证其投资效益。知识现在成了新的资本形态。以实物形态表现的传统资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时空有限性。知识资本却不同,它具有无限的延伸性。同一种知识可同时被许多不同的使用者应用。而且运用知识的同时也是创造知识的时候,知识不可穷尽,无法独占。这就是知识资本的革命性特征。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知识已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随着这种状况的发生,知识正在升值。正因为如此,争夺知识或人才的信息战才到

处在激烈地进行着,而且会越演越烈。

经济的知识化或知识经济又被称之为“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其特点之一是知识密集性行业取代了那些主要依赖于原料和劳动力的制造业的地位而迅速崛起。另一显著特点是,知识增长率和淘汰率以超速递增的速度同步运行。所以,知识经济是一种快速运转的经济。在当今的世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时间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就使得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必须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努力实现与发达国家同速运转,否则只能依附于发达国家。总之,“知识是现代经济特别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新闻决策人物的共识。

随着知识信息通过越来越庞大的计算机网络、电视媒介、电话通信设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但经济出现了飞速的运转,而且也极大地加速了政治变革的速度和变革的模式。更要引起格外关注的是,由于电子通信系统的发达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已完全改变了过去曾经出现的先进知识理论体系只局限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圈内,然后经过各种社会变革逐渐为社会大众接受这样的历史变迁模式。这种历史模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其所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痛的。现代社会的知识理论系统借助于移动网络技术,借助于不断提升的智能电子信息系统快速传播,社会变革可能更为快速,所需代价也可能会减少。

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全方位地渗透已使社会及其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将发生更为巨大的变化。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是培根所始料不及的。可以断言,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已不仅仅是力量,它也是权力,是财富,是资本。知识更是现代社会发展与演变的真正的原动力。谁想成为现代及未来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世界的引领者或主宰者,谁就必须形成和掌控最新的知识理论体系。未来学家的共识是,知识已经成了全球范围

内的K因素。要在未来的世纪中立于不败之地,求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掌握世界范围内不断更新的知识系统。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社会。

关于知识社会的图景,也越来越引起一些哲学家的更大关注。在知识论研究领域内,表现为“知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拓宽。人们现在更为关注实际渗透于政治、经济及科技活动中的知识现象。传统观念认为,知识是真的信念,知识是以真命题表达的;而现在,一些哲学家却从信息的意义上来定义知识,认为知识就是正确的信息。这就使知识论的研究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由于中国文化中的逻辑意识与认识论意识素来不强,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过自己的严谨逻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也几乎没有关于知识理论的系统研究。正是这样的历史传统造就了中国学者对于经典注疏的过度关怀,对于上古三代的不切实际的迷思与留恋,遂使中国学界对知识论的研究历来不感兴趣,所以对知识的作用也不曾给予应有的热情关注与研究。

英国产业革命前,人类历史发展依靠的是主要是经验或经验性的要素。但是之后的世界历史却走上了一条性质完全不同的道路,亦即知识在整个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甚至是主宰的作用。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盛主要受惠于2个因素:1)古希腊时期以几何学、逻辑学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2)文艺复兴后的以寻求因果关系为目的的可控的精确实验。前者是后者的理论知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技术落实。

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这2个要素。近代以来,中国通过引进的途径在可控实验及其技术方面有所进步。但是对实验技术的基础即系统的知识理论的研究至今仍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如何加强与推进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所以,建议中国政府组织相关人员研讨如何在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产业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仅仅沦落为产品的模仿、加工、组

装。只有在长期的和系统的知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整体实力才能不断进步,才能逐步建设为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文化强国。舍此绝无其他的道路可走。

2 如何实施知识理论创新

要真正能够实施知识理论创新,必须切实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为促进中国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或发展,教育尤其是中等及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首先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不能满足于那种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命题固然有其合理的意义,却也不免过于笼统和模糊,对之不可能形成相应的知识理论体系。任何一个知识理论体系都是针对于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的,如关于自然的,关于社会的,关于人文的。严格说来,这三类划分也很宽泛,也同样不可能形成知识理论体系。思想演变的历史表明,人类只具有关于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而数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也在继续明确研究对象,有几何学的、代数学的等更为细致的划分。同样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有着各自的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如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心理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艺术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也都如此。可以清晰地看清,各类学科都有着各自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因此这些学科之间也就有着明确的界限。细查历史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这些学科的创立者都是西方学者。更为令人焦虑的历史事实是,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来几百年历史,我们在连续不断地丢失自己的话语权。目前不少学者在大声疾呼要抢回话语权。但是问题的实质却是,我们究竟依靠什么才能抢回自己的话语权?更为重要的是,究竟什么才是话语权的基础?根据上述的讨论,就能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话语权就是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系统严密的知识理论体系。

有了关于某类问题或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也就自然而然具有了话语权。反过来讲也就是,没有关于各类问题的知识理论体系,也就没有在帮他领域内自己的话语权。接下来的问题也就很明确,即我们丢失话语权的历史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明确或相对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而长自古以来迷失于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满足于纠缠在那些高大上的口号或标语的话语方式上。

要促进中国知识理论体系的思辨能力及知识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必须诱导学者与学生将自己有限的人生用来思考和讨论那些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而不能将自己有限而宝贵的人生完全埋在模糊笼统的思维模式之中。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教育目标也得做相应的调整。中国的教育历来重视书本的阅读和疏解,强调读书要破万卷。从幼小时起,读书、背书就占去了年轻人的绝大部分时间。其实这是对基于目标的曲解。读书不应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历史地看,经典阅读的目的是让我们站在古往今来伟人的肩上去系统地思考、严密地讨论和较为全面地解决自己面临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及其他种种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强烈兴趣和讨论思考。教育的本质属性及其目标只是让学生在阅读经典的基础上去思考经典里所涉及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而不只是熟读和背诵经典。

第二,只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才能在学术研究的历史上导致分科治学模式的出现。因为能够对之做具体讨论的问题只能是明确而清晰的,只能是关于自然或社会或人文现象的某一方面的。这也就使具体而清晰的问题之间有着明其的界限。针对不同的问题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学科来进行讨论研究。这样的分科治学的学术研究模式不是产生于历史中。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就从未追求过明确具体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而只是满足徘徊于模糊而笼统现象的,而只是

在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充满诗意的想象。追溯学术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可以看到分科治学的传统诞生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如《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每一篇都几乎集中讨论某一个明确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确立了分科治学的学术研究模式。一部《亚里士多德全集》就包含了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学术史表明,正是分科治学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繁荣。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不重视这样的分科治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系统内根本不可能形成能够经得起论证或诘难的思想理论体系。

应该说,明确清晰的问题在人类的认识历史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毕竟还有更多的模糊不清的认识对象是迄今我们无法解释或认识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即近代以来几百年的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奠基于各种各样的知识理论系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由于仍然满足于传统模糊笼统的思维模式,更多的是出于民族情感的需求,在以分科治学为主要模式的大学内出现了分科治学与国学并存的现象。中国学或国学基于对历史中国现象的研究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但中国学或国学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因为中国学或国学缺乏最起码的明确清晰的定义或研究对象,也更无可以用来操作的具体的学术流程或系统有效合理的思想方法论。

以分科治学为主的现代大学模式主要是学理性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所谓的学理性,指以分科治学为前提而形成的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当然分科治学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其实,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各个不同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须积极提倡跨学科的交流,以弥补分科治学带来的学术研究的不足或弊端。这一学术研究的趋势也就给提倡或推行中国学或国学的学者似乎提供了理

由。他们认为中国学或国学能够弥补分科治学的不足,为跨学科交流提供平台。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明确清晰的问题或研究对象,尽管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其不足,所以现在仍然需要从跨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以前对问题或对象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但这样的跨学科交流的平台依旧是分科治学的研究模式。如心理学就与脑科学或生命科学等密切相关的。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心理学就容易流于文学般的想象。

第三,有了比较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之后,才有可能对之进行系统而有效的讨论、论证。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对那些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才有可能进行系统明确有效地论证。模糊笼统的口号或标语只能被无情地排除在论证或讨论的范围之外。只有经过了严格有效论证的思想或信念才能转化为知识理论。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证实,只有经过系统有效论证的知识理论才有可能转化为技术性的产品。同样的,社会的改造、进步也奠基于经过严密论证的相关的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理论体系,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改造更得需要有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引导。

要对问题或对象进行论证或讨论,就必须有一定的思想工具。思想必须有工具,但光有工具不行,还必须有关于思想工具的系统理论。亚里士多德一生中研究过不少的问题,如关于伦理的、政治的、逻辑的、物理学的等。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对之进行论证或研究的问题或对象都具有相对明确的对象或领域。比如他就将政治学的研究问题与伦理学研究的问题明确地区分开了,认为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与孟子的大不一样。后者试图从性善推出仁政。性善显然是属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而仁政却落在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可见在孟子的思想里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治学的思想视野。既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当然就缺乏可以操作的思想工具,也更无必要

进行系统论证的必要。

论证的目的是为讨论问题的过程及其答案做有效、合理而系统的证明。针对问题提出的答案的合理与否,完全取决于论证过程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而与参与讨论的学者的社会地位等毫无任何瓜葛。这样的对话完全是理性的、客观的、平等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就是这样的对话推动了知识理论体系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中国的文化系统内真正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真正平等的客观而又理性的学术讨论。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的论证或讨论是在学术团队内部进行的。参与讨论的学者可以站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但辩论时各方都必须完全遵循思想的论辩规则。学术圈内的如此对话,不同观点之间的据理力争可以激活思想,突破已有思想的樊笼。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柏拉图学院就是这样的纯粹民间的学术机构。后来出现的大学。学术共同体的宗旨就是,论辩一定要自觉地遵循逻辑学理论规则,并能够共同自觉抵制来自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干预。世界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知识理论体系的进步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能够真正地促进知识理论的持续进步,不断创新,就必须自觉而坚决地遵循学术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能随意加以干预。干预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扼杀思想创新,断送学术生命。

与其他领域内的创新一样,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异端,就是背离传统。固守已有的传统,永远不可能有创新。

第四,分科治学曾在人类历史上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进步与发展。知识的急剧膨胀和迅速传播就最为鲜明地说明了分科治学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在过去的10年中,信息数量以数亿倍数在增长、传播和淘汰。知识与信息淘汰或增长的速度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世界的性质。

但必须清楚地看到,知识与信息的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是,过于琐细的分科设置只能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拥有某一领域内的专精知识系统

的专家,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知识创新人才。早几年美国一些大学提出了跨学科交流的创意和计划。无疑,这样的创意和计划是符合学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新趋势的。但在中国高校,由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却无人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关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及构成。因此现在的大学体制和研究机构遵循的仍然是早期传入中国的过度的分科治学的原则。这样的学科设置至多只能培养知识面狭窄的专家或技术人员,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知识创新的人才。因此,这样的学科设置必须逐渐改变。同样,教学模式不应是灌输式的,而应是对话式的、讨论式的、启发式的;要注重过程式的教学模式,不要过分强调结论或结果。更要培养和爱护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对熟悉的事物或不熟悉的事物的惊奇感或好奇心。

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力图打通各学科间的界限。此种学科综合的目标就是以知识理论体系为基础来综合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文理、理论与技术等;强调相近学科即人文学科(文史哲)之间的融合,即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学科之间本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设计将这些相近的人文学科放进一个大学院之体制之内;突出文理之间的交叉,强调文科的学生要有自觉学习一门自然科学或科学史的兴趣;理科学生学习文科,反之亦然;重视跨学科之间的融合,如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音乐、绘画等本就与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有着天然的关系;理论研究人员与技术过程人才的交流与合作;鼓励与加大对跨学科的研究项目与学术会议的投入与资助;提倡设置与建立跨学科的学会;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等。

但是强调跨学科研究不是完全否认分科治学的重要性,更不是说要回到传统完全不分科的思维模式上去。而是相反,分科治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各种深入系统的知识体系,才是未来跨学科交流与创新的基础。舍此,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思想或知识体系创新的可能。所以没有相

应的分科治学,也就不可能有学科之间的综合与创新。

第五,要根本改变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投入方式。政府很重视高校和以及研究机构的建设,但是目前的投入方式却难见成效。因为这种投入方式完全与知识创新的模式背道而驰。建议:1) 重视对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2) 基础学科、理论研究的投入不应采取课题或项目制,而是要普遍改善科研人员的研究条件,使科研人员的工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这种投入方式也可以极大地降低甚至取消高校和研究机构内的行政过度干预学术研究的现状,给教师和研究人员宁静而安全的研究环境;3) 目前盛行的课题或项目制度已经弊端丛生,干扰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正常工作。而且课题或项目制只注重开题的审核,没有对课题或项目过程和终端成果的严格审查的程序好办法。其结果是,重大项目或课题虽有大量的经费投入,但其终端成果绝

大部分是毫无新意。而且这种研究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人员的心理、道德等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所以,应尽快改进这种课题或项目制;4) 不能将教学和研究人为地分为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特聘教授等三六九等。这种人才投入模式不但无益,反有极大的问题和极多的弊端。

第六,近30年来,由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合并,中国目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研究人员与学生数量也随之激增。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管理能力及水平却相当的滞后。这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极大的张力。此种情形极其不利于中国学术的繁荣与知识的创新。根据目前中国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超大规模,要完全去行政化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过分的行政化管理确实也严重的干扰了学术研究。但要完全地去行政化,也会使大学及研究机构失去相当的依托。因为

毕竟学术研究与高校的管理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不适当地强调教授治校未必适当。现在急需要的是改变行政管理的模式,即大学及研究机构所需要的管理必须要逐渐完全而严格地奠基于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规律,遵循思想自由、学术至上的原则。而且更要认清的是,目前大学及研究机构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意识形态的管理模式。此种主导模式强调的只是思想上的统一,以为思想上统一了,行动上也就统一了。殊不知,这种以意识形态为主的管理模式阉割的真是自由思想的能力及其知识创新的可能性。两者之间完全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知识创新就是对主导思想的背离,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所以高校及研究机构内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必须逐步地退出,让位于以学术思想研究为主导的管理模式。

(责任编辑 陈广仁)